

## 從海外漢學看軸心漢學

平田昌司\*

如果跑北京海淀的第三極、漢學書店、博學堂、萬聖等幾家書店，架上可以發現大量冠以「海外漢學、國際漢學」的圖書。雖然每一本書的印數不算很多，也不一定特別暢銷，但種類相當可觀。據說前不久仍然存在「碰上洋人、洋著作就採取了雙重標準」<sup>1</sup>的情形。另外，時常能聽到「軸心漢學」<sup>2</sup>針對海外漢學——往往不是針對海外漢學本身，而是針對軸心漢學內部的「買辦」勢力——的批評聲音。總之，海外漢學並不是軸心漢學要全面默殺的對象。我想，如果在東京神田書店街尋找「海外日本學」的譯介圖書，種類不可能有那麼豐富。而且不用諱言，日本國內「軸心日本學」對於海外日本學幾乎不置一顧<sup>3</sup>。又如法國的法國文學研究者是否關注「海外法國文學研究」的最新動態，也要打個問號。竊以為，軸心漢學給海外漢學提供的正、負兩面的高規格寵遇，頗值得注意。而海外漢學在各國人文學界所占的地位經常是淨丑，甚至是跑龍套，極少扮演小生正旦。

陳平原先生訪談錄提到「與漢學家對話時……可能面臨的三個問題」。下面就此說說本人的一些感想。

---

\* 平田昌司，京都大學文學部文學研究科教授。

<sup>1</sup> 葛兆光：〈缺席的中國〉，《域外中國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

<sup>2</sup> 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是漢學研究的核心區域，也是正朔所在。本文把這核心區域的漢學稱為「軸心漢學」。軸心漢學和海外漢學（主要是北美漢學）之間，似乎隱約存在正閥意識上的對抗關係。

<sup>3</sup> 日本早期官學系統有不少「軸心日本學」研究者曾經留學歐洲，西文能力很高。

## 一、「海外漢學」的兩個極端

陳平原先生提到的第一點是「與漢學家對話時，應具備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第二點是「與漢學家對話時，應保持平和的心態」。其實世界各地的海外漢學各有不同的特徵，而且各地內部還有種種學術態度。我站在非西方學者的立場去翻看（我的西方語言能力太差，不敢說「閱讀」）西方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很容易感覺到他們做研究的路子往往以歐洲人文修養和訓練為背景。這種不同系統的學術背景，其研究思路和手法上的差異，應該是西方漢學最可貴的成分。例如一些歐美漢學家的歷史學著作所參照的歐洲史研究，Patrick Hanan 在 *The Chinese Short Story* 的小字腳注裏談到的西方文體學，這些都不能當裝點門面的虛飾看待。中國第一代留洋學人多數浸染西方學術，並且這一特點給他們的研究賦予了特殊的魅力（如德國 Heinrich Lüders 對陳寅恪的影響）<sup>4</sup>。第一代有時以這種學術訓練為背景去評判第二代以後的留洋學人。例如李方桂在一九八四年說過：「現在的學生都是有所為而來求學，學語言學的不下數千人，但是論文題目仍是漢語音韻、方言、文法等，很少人肯學一個自己不知道的語言。」<sup>5</sup>不過，這一類海外漢學往往很不符合中國本土的口味和遊戲規則，甚至被軸心漢學看成邪門作風<sup>6</sup>。

海外漢學還有另一個類型：儘量模仿軸心漢學的思路和研究模式，努力做得「比中國人還要中國」。這種漢學背後的意識形態，大而言之，是與中國讀書人廣泛合作的希求。同時不無其他一些更具體實際的原因，諸如：依傍主流學風的安全感、對論文寫作典範的需求、容易得到軸心漢學的認可等等<sup>7</sup>。總之，這是一個不

<sup>4</sup> 參看拙作：〈讀陳寅恪《四聲三問》〉，《學人》（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10輯。

<sup>5</sup> 丁邦新：〈李方桂先生的來信〉，丁邦新、余霽芹主編：《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美國華聖頓大學，2000年），頁383。

<sup>6</sup> 假如有一個人有關本國文化的基本知識、訓練明顯不足，到海外把本國學術研究作為棲身之所，同時又對外倚仗自己的母語母文化身分，其危險不言而喻。

<sup>7</sup> 海外漢學互相之間的信息不一定很靈通，要是海外甲地漢學研究得到軸心漢學的賞識，乙、丙等各地海外漢學便對甲地漢學刮目相看。例如日本的古典中國小說史研究者對歐美的研究動態不一定人人都很敏感，這跟中國大陸學術界的現狀基本平行。

很吃力而且能向軸心漢學討好的做法。不過，弄不好僅增加一個表演不夠理想的「擬軸心漢學」而已，甚至會削足適履，主動放棄自己原創的潛力而附和主流。

更值得擔憂的是，近些年來軸心漢學的學術論文「策、論」化的大趨勢明朗起來<sup>8</sup>。由於大學教師評鑑制度的影響，當代中國人文學界無論上下對克隆著作的反應（包括大量的「自我抄襲」）不可思議地遲鈍，各地出版內容重複的大型叢書，很像明末出版事業的繁榮。我曾經很擔憂軸心漢學的前途，甚至有「扶吾眼縣吳東門之上」的戰慄。因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軸心漢學空間的流行現象會很快蔓延到海外漢學。後來發現自己太不樂觀，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不都是從天啟崇禎的知識社會裏出來的嗎！我們應該堅信軸心漢學以及海外漢學的前途是金光大道。害怕粗製濫造的消極影響，實在是杞人憂天。

當然，將來的海外漢學會成為什麼模樣很難預料到。軸心漢學本來「絕非鐵板一塊」，海外漢學不得不更加複雜。記得第一次看到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的著作，發現作者姓名是印度式的，感到十分意外。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像過竟會出現一個印度裔「漢學家」。我很好奇，倘若將來出現成群的非洲漢學、拉丁美洲漢學，這些會有甚麼樣的特色？況且當代中國愈來愈引起多種學科的興趣，目前有不少海外中國研究者對所謂「漢學」完全陌生。

關於陳先生所提的第二點，我個人認為，海外漢學對待軸心漢學的態度也應該如此。因為跟軸心區域的學者進行交流時，海外漢學一方容易出現「只有外國人纔能認清廬山真面目」或者「遠來的——即來自軸心漢學區域的——和尚會念經」的矛盾心態。

## 二、作為資源的海外漢學

陳先生提到的第三點是「所謂的學術交流」層面的擴大。以韓國、日本和軸心

<sup>8</sup> 按照傳統作法，「策、論」不一定要掌握大量的原始資料，而且考生抄襲「策學指南」類參考書，閱卷人員會睜一眼閉一眼。我有兩個荒唐建議：(1) 學術機構的人事考核制度上應該明確要求提交「策、論」。這樣每年生產文章很方便，可以擠出不少時間去做純學術研究；(2) 出版社和雜誌編輯部也應該明確區分這是「策、論」，這是學術研究。以便讀者根據自己的需要選購、學習。最近看到某著名書局出版的古典文學研究著作，該書為了論證某一史實大量引用「概述」、「全史」之類東西，但作者似乎沒有去閱讀原始資料，因而有此感慨。

漢學的交流為例，在「資料層面」歷史上有過好幾次西傳現象：十八世紀日本所傳古經注疏異文、十九世紀的大量佚存書、二十世紀古白話小說、最近十年軸心漢學「發現」韓國漢籍，等等。至於禮失求諸於野的具體例證，恐怕無法一一枚舉。因此在過去一段時間，軸心漢學常把海外漢學當資料管理部門或其聯繫人看待。換句話說，軸心漢學一方也確實存在「我只買你們的資料集。你們的資料，多多益善；至於理論，我們自己有」的心態。

另外，海外漢學一方常有未能被軸心漢學充分理解、釋讀的悲哀。美國某一位學者曾有感慨，日本、中國漢學家英文文學的修養不夠好，沒有體會到西方作者在修辭方面所下的工夫而指摘翻譯錯誤<sup>9</sup>。以大量的日本漢學著作的譯本為例，準確可靠的到底有多少，讓我十分擔心。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書面、口頭的溝通還算比較低級的。把交流擴大到「技術、理論」層面，這也還比較容易，想要進一步擴大到「精神層面」難度較大。在我的記憶中，已故中島碧先生及其中國友人是真正做到「精神層面」交流的少有例子，令人追懷痛惜<sup>10</sup>。

### 三、近代日本漢學的若干問題

如果要把交流擴大到漢學的「精神層面」，日本漢學和軸心漢學之間始終存在著很多人一直在迴避的話題，即近一百五十年的歷史關係。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漢學已經徹底失去了日本主流話語、主流學術的地位。處於西學和「國民」意識的強烈影響之下，漢學不得不面對下列幾個抉擇：首先，是否積極吸收西學或西方漢學的思路和方法；其次，是「中國化」還是「日本國粹化」；第三，是「精英化」還是「大眾化」；第四，是「世俗化（走近政、軍、商界的權力）」還是「非政治化（消遣、玩世、純學術）」，等等。而經過調整的漢學各派又反過來扭曲了——縱然它的引力相對渺小——日本主流話語的空間。另外中國近代人文學術的動向也十分複雜，各時、各地、各派有不同的學風。對此情形，日本漢學界或者為了「預流」奮力駛船，或者有意拉開距離，漂泊在外。這一時段之內出現的日本漢學各種

<sup>9</sup> John Timothy Wixted：〈中國文學及び日本文學——西洋人の研究方法について〉，《東京大學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紀要》第4號（2001年4月），頁47-65。

<sup>10</sup> 陳平原：〈共同研究是否可能〉，《茱萸集》（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1年）。

類型<sup>11</sup>，不僅是學術體系自律發展的產物，還代表著二十世紀中國不同知識階層的知識體系給日本帶來的不同影響。比如狩野直喜跟晚清民國的傳統派精英<sup>12</sup>、竹內好(1910-1977)跟中國留洋派精英、橘樸(1881-1945)跟中國民間等等<sup>13</sup>，他們隔海凝視的「中國」各有不同的實質。日本漢學的多樣性實即代表著近代中國及軸心漢學內部的多層次性。

侵華戰爭把漢學內部原有的複雜性幾乎掩蓋掉，後來把中國知識界截斷為屈服與抵抗：

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蓋以勝敗繫於科學技術與器械軍力，而民氣士氣所補實微。況中國之人心士氣亦虛怯怯懦而極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實，憑理智，以觀察論斷。但恐結果，徒有退讓屈辱，而仍無淬厲湔祓耳。（《吳宓日記》1937年7月14日）<sup>14</sup>

可是，閱讀一九四五至四七年的胡適來往書信，中國知識界對待「屈服」、「合作」的態度，讓人感覺到其中不無難以言喻的地方：

<sup>11</sup> 本文所謂日本漢學的涵義比較廣泛。溝口雄三先生所描繪的「日本漢學」形象（下面外加括號的「日本漢學」指日本近代支那學形成以前的傳統漢學），通過孫歌：〈日本漢學的臨界點〉，《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15-246等的介紹和批評，對軸心漢學產生了不少影響。其批評理路清晰，很有魅力。事實上，溝口先生在批評二十世紀後半期的整體日本漢學，因此其論斷往往有很強烈的誤導性，甚至不無給「日本漢學」戴帽子的味道。筆者在2007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所做演講〈日本熊本學派和「中國文學史」的產生〉涉及到了十九世紀「日本漢學」評價問題。

<sup>12</sup> 在日本支那學興起的時代，清朝尚未滅亡。假如支那學家想跟當時中國的精英階層進行直接、深入的交流，必須掌握清朝三百年的學術家底。這事實跟支那學的學術特點很有關係。

<sup>13</sup> 還有日本「非漢學領域」人物中，堀田善衛(1918-1998)的想法是值得注意的，也許足以成為一個類型，參看《上海にて》（1959年）。另外，參加侵華戰爭的日本普通士兵、戰爭期間定居在中國的日本僑民，他們在中國寫下來的日記、書信、學生作文等大量文獻包含不少實地觀察的記錄，應該是考察「淪陷」的重要史料。這方面的研究正在開始，參看荒井とみよ：《中國戰線はどう描かれたか——從軍記を讀む》（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

<sup>14</sup> 《吳宓日記》1937年7月21日：「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

〔沈〕兼士是苦節孤忠，全活留平一部分朋友的名節，非其他某派某系可比，應由先生斟酌，請其回校。凡參加偽校者，即知堂亦在不赦——請先生萬勿留情。（羅常培 1945 年 9 月 22 日致胡適信）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投降不久，胡適及其友人已經開始討論對將來的期待：

關於莫利遜文庫的建議，我沒有積極意見。我個人以為此種用私家錢購買去的，或可不必討回。如北平東廠胡同之東方文化圖書館，是用庚款建立的，既在北平，可以沒收，上海之兩三個研究所，也是用庚款建立的，也可以沒收。其餘用庚款建立維持的文化機關，若不在中國，——如京都帝大之東方文化研究所，——也就不必〔平田案，原稿作「可」，後來塗改成「必」〕問了。此項研究機關，我們似宜鼓勵日本繼續維持。（胡適 1945 年 9 月 27 日致王重民信）<sup>15</sup>

中國一般社會確有充分了解日本情形與美國作法之必要。弟頗思請兄赴日本作二三星期之考察。弟相信麥將軍及日人必均聞而興奮。（王世杰 1947 年 12 月 7 日致胡適信）

我也贊成明春先生能往日本走一趟。我的理由是：（一）我們學術界常常有到日本索賠償，搬去古書古物的喊聲，日本的學界也時時怕我們去搬古書古物，可是事實上有個法律，都不那樣容易。最好我們要少喊，他們也不必害怕。（二）日本的軍閥走錯了路，學術界也跟著軍閥走錯了路。我們現在明白，認識的很清楚，所以希望日本的學術界應繼續向學術努力，來和我們合作。……（王重民 1947 年 12 月 7 日致胡適信）

後來由於長期冷戰和海外漢學家所面臨的「是臺北還是北京」問題，王重民期待的合作未能順利進行。況且戰後日本知識界內部政治走向的不同、人文學術的意識形態化相當突出。假如不願意在政治判斷上、學術抉擇上走錯路，「繼續向學術努力」，重點應該放在客觀考察，若干年後必然得到「日本學者擅長的就是資料的蒐集整理」的評語。另一方面，有些人在大陸、臺灣都缺席的情況之下反顧戰爭、摸索理想，結果出現了「從竹內好到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他們都有很強的思辨能力」的局面。學術風格跟本地文化的歷史背景是很難分開的。

<sup>15</sup> 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卷 25，頁 168。